

贵州文化系列丛书

编委主任 苗春亭

独特的社会经纬

—贵州制度文化

黄才贵 编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独特的社会经纬

——贵州制度文化

黄才贵 编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黄才贵编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2
(贵州文化丛书/吴雁南,史继忠主编)
ISBN 7-80650-086-3

I.独… II.黄… III.制度-文化-研究
-贵州 IV.K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8493 号

贵州文化系列丛书
独特的社会经纬
——贵州制度文化
黄才贵 编著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字数 12 印张 300 千字
印 数 1-1,080(册)
版次印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086-3/K·4 定价: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电话:6747787 邮编:550001

贵州文化系列丛书

编委主任:苗春亭

编委副主任:黄瑶 龚贤永 何才华

编委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史继忠	冯楠	冯祖贻	向阳生
刘学洙	刘鸿麻	时培真	吴雁南
何才华	余克	苗春亭	姚康乐
顾庆金	钱荫愉	侯存明	翁家烈
龚贤永	黄瑶	黄钧儒	曹新忠
蒋南华			

学术组成员:蒋南华 冯祖贻 翁家烈

主 编:吴雁南 史继忠

本书主审:史继忠

本书助审:张雁南

《贵州文化系列丛书》总序

苗 春 亭

1995 年的金秋时节,在风景如画的花溪召开了一次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 150 多名学者,在会上畅谈“贵州文化”,这在贵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说明在学术界已经引起了重视。受到这次会议的启发,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便开始酝酿编写一套《贵州文化丛书》,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一批雅俗共赏的读物,向广大读者介绍贵州文化。

“贵州文化”这个概念,作为区域文化来说,应当是可以成立的,只不过以往人们研究不多罢了。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由于各地情况不一,民族众多,开发有早有晚,文化传承也有差异,这就形成了既有同一性又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

贵州文化的特点,可概括为四个字,即“多元一体”。贵州文化的多元性,是由民族特点、地方特点和地理特点决定的,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汉族移民又来自五湖四海,而且文化上深受巴蜀、荆楚、两粤和滇的影响。然而,贵州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贵州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彼此渗透,并在特殊的历史、地理、社会条件下趋向同一,共生共荣,这又表现出它的一体性。

平心而论,贵州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文化教育受到一定限制,但贵州文化却显现出许多闪光点,就内涵的深厚,表现形式的多样,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贵州的史前文化,曾经放射出奇光异彩,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山地经济,别具一格,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多有创造。喀斯特地貌是贵州的一大特色,从多方面影响贵州文化。岩石载体文化殊为独特,仿佛步入了一个神奇的石头世界。制度文化,既有别于“内”,又有别于“边”,“土流并治”长期延续。原始宗教的影响相当深远,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屯堡文化引人注目,显得古色古香。蜡染和服饰,是贵州文化的一朵奇葩,蜚声海外。诸如此类,颇具特色,而贵州历史上涌现出来的许多杰出人物,对推动历史前进、繁荣中华文化又作出了诸多贡献,值得我们效法。

对贵州文化要有全面的、正确的估量,要理直气壮地宣扬贵州文化中的积极方面,也要努力克服自身的不足和缺点,以科学态度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抓住机遇,准备腾飞,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上,贵州将会进入一个辉煌发展的新时期。

这套丛书,主要是反映贵州文化的独特之点,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但因为这还只是一种探索,一种尝试,难免有所疏漏,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求提高。

目 录

和合发展的贵州文化板块	(1)
一、贵州制度文化的特征	(24)
1.1 多种基础与失衡发展	(25)
1.2 三种类型的构成要素	(33)
1.3 不边不内与变容渗透	(44)
1.4 以人为本的双重结合	(51)
1.5 包夹分割与融突和合	(65)
1.6 区域观念与多元一体	(75)
二、贵州制度文化的历史演变	(83)
2.1 “郡国”并置	(85)
2.2 经制、羁縻与邦国	(91)
2.3 “土流”并置	(97)
2.4 改土归流	(104)
三、黔南瑶族的油锅制与石牌制	(111)
3.1 “油锅”制的变迁	(115)
3.2 “石牌”制的形成	(127)
3.3 两种制度的共生共存	(149)
四、黔东南苗族的议榔制	(163)

目 录

4.1	支系寻根与家族组织	(165)
4.2	“鼓社”祭的由来与发展	(176)
4.3	“议榔”制与习惯法	(191)
4.4	“爷头”与“洞崽”的成因	(204)
五、黔东南侗族的峒款制		(221)
5.1	世居溪峒与本位生存	(222)
5.2	家族与村寨的组织原则	(226)
5.3	鼓楼的社会功能	(238)
5.4	“峒款”制与侗族形成	(245)
六、黔西南布依族的亭目制		(259)
6.1	峒官与村社	(260)
6.2	亭目拓展与寨老职能的变化	(269)
6.3	制度转换与社会构成	(284)
七、黔西北彝族的则溪制		(294)
7.1	家支宗法化产生的社会能量	(298)
7.2	则溪传承与政权的关系	(306)
7.3	同一契机与两种运作方式	(333)
八、军屯制度及屯军后裔的制度观		(343)

目 录

- 8.1 卫所设置与贵州建省 (344)
- 8.2 社会变革与制度转换 (353)
- 8.3 黔中屯军后裔的制度文化观 (357)

和合发展的贵州文化板块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1月7日,有位年轻的日本东京大学的人类学学者,冒着寒风细雨,沿着清代的黔滇驿道,从今关岭县的坡贡步行到了郎岱。抵达目的地以后,他照例与当地官员闲聊、借阅当地的地方志资料、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当他在郎岱第一次见到“傜人”(今彝族)时,察看其体形、细听其语言 and 了解其风俗习惯,觉得与当地的苗族有很大差别,认为这是人类学上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他还认为,郎岱的地理位置是联络黔、桂、滇、川的“交通枢纽”。北盘江源于滇东与黔西交界处,经郎岱境而南流广西;而地处流向四川的横江(金沙江支流)上游的威宁,与水城和郎岱毗邻;由于水路的便利,无论从滇、川、桂,都容易来到郎岱。这样好的地理位置,来自各处和各种不同民族的人们都会到郎岱聚集。这里,正是调查研究各民族的最好的“族群文化展览会场”。他认定,“傜”的先民就是顺北盘江源头而下和沿横江而上由滇、川入黔。所以,郎岱地方,不仅是进行“苗族调查”的最佳地,同时也是研究“苗族”(广义的)与“傜”之间关系的最理想的场所。这位日本学者只是初次考察了贵州的山水,就已体会和认识到这里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难怪他后来成为了国际知名学者。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民族》卷《民族学

家》条、《考古》卷《外国考古学简史》条，均收录有他的生平业绩。他就是国际著名的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先生(1870—1953)。

早在台湾调查时，鸟居龙藏从法国东方语言学家 T. 德·拉古佩里(Terrie De Lacouperie, 1845—1894)的《台湾笔记》(Formosa Notes)一书中得知台湾北部山上的“黥面蕃”(今高山族泰雅人)与大陆苗族的关系的情况。为了探讨这一学说，特地沿湘黔滇驿道在贵州境内考察了 40 天，用当时的最新技术拍摄了 108 张照片，并收集了 16 件民族文物。在他著述的旅行记《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和《苗族调查报告》两本书以及与贵州民族有关的《关于我带回的一面铜鼓》等 27 篇文章，不仅详细地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而且对黔滇川的苗族、布依族、彝族等民族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①。1936 年，国立编译馆翻译出版了他的《苗族调查报告》。1937 年，江应梁(后任云南大学教授)在《现代史学》第 3 卷第 2 期上发表《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一文，认为该调查报告显示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同年，贵州著名的苗族学者杨汉先撰写的《苗族述略》，就受到了鸟居龙藏关于苗族学问的深刻影响。1945 年，任可澄总纂的民国《贵州通志》曾多处引用过他的《苗族调查报告》。固然，贵州变成了中外学者心目中的“和合发展的文化板块”。

宇宙间一切现象都蕴藏着和合。中国人常说的“以和为贵”之“和”，其原意为相应，引申为和谐，特别是多种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也就是我国古籍《国语·郑语》记载的西周末年史伯提出过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论语·学而》还记载，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更加明确地将“和”视为全部社会制度的价值旨归。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自然篇》也说过：“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因此，产生万物的根源，就

是这种“气”本身的运动。我们讲的“和合”，就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而回应各种挑战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很可能是“和合学”^②。其实，贵州文化板块的构成和发展，无论历史的或现实的，总是在融突和合之中运动着、发展着，并以融突的“和合”之梭编织出社会的经纬。



贵州是由多民族多元文化构成的一个“不边不内”的后发展特征的省份，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怎样构建贵州文化板块，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进入新世纪发展中的定位。从贵州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及现状看，无论其发展方式还是其演化规律，无论与我国东部和中部相比，还是与周边省区相比，在其总体上皆表现出后发展特征。从历史文化背景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其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尤其是经济理念方面，具有更大的特殊性，从而构成了物质文化主体的残缺不全、资本原始积累断层的巨大差异、精神文化的纯净朴实和“一步跨千年”式的制度文化。我们认为，这就是贵州文化板块的历史构成。这种历史状态的要素，可以用“多、长、大、偏、后”5个字概述。

“多”，是民族成份多和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多。全省有49个民族成份，其中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蒙古族、仫佬族、满族、羌族等18个世居民族。除此之外，还有少数未认定的人们共同体。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全省总人口

3 508.08万人,汉族人口 2 217.99 万人,少数民族人口 1 290.09 万人(包括待识别的人们共同体),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36.77%。人口超过 10 万的少数民族有 9 个。在全国,有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水族等民族主要聚居贵州,分别占全国本民族人口的 49.8%、97.3%、55.7%、98.2%、93.2%。贵州少数民族成份个数仅次于云南、新疆,居全国第 3 位;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次于西藏、新疆、青海、广西,居全国第 5 位。^③

“长”,是贵州各民族的历史渊源流长,来源于两大部分两大语系 8 大族群,包容大江南北。其中,源于古代南方的有百濮、百越、氐羌、苗瑶等 4 大族群,源于中原及东北、西北地方的有华夏、穆斯林、胡、肃慎等 4 大族群。由于贵州在明代建省的特殊地理构成以及地处今湘、桂、滇、川 4 个省(区)之间,在古代就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的结合处。先秦时期,今贵州境的夜郎地方居住着今仡佬族等民族的先民——百濮族群,现今的仡佬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百越族群居住在秦象郡地,包括今黔东南(部分)、黔南、黔西南等地区,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现今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仡佬族等民族。今彝族等民族的先民——氐羌族群,约在公元 3 世纪以前,陆续拓展到今滇南、滇东北和贵州西部,到宋元明时期已延伸到贵州中部地区;土家族的先民,自秦巴郡、黔中郡向今黔东南地区扩展;于是,逐渐形成今彝族主要居住威宁及贵州西部地区,土家族、羌族主要居住今黔东南的沿河、印江等县;这 3 个民族的语言,均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属于苗瑶族群的苗族、瑶族、畲族等民族,其语言均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其先民自离开中原经过几次大迁徙,于先秦时期逐渐由楚西南向今贵州扩展:除黔东南地区聚居着约占全国苗族总人口的 1/4,为全省苗族人口的 49.5%外,其他则居住黔南、黔西南

及散居贵州各地,形成许多星点分布;瑶族约在明清时期,分别从广西、广东移居或相邻行政区划的变革划入贵州,散处南部地区的10余县。秦汉前后,华夏族群的汉族自然移居今贵州地方的人数很少,自秦汉王朝在今贵州境设郡县、开驿道而进行政治或军事移民以后,汉族才正式参与了对贵州的开发;特别在明清时期,“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的军户、民户以及商人、手工业者大批量地涌入贵州,除屯居交通要道和城镇外,还逐渐散居到全省各地,不管在哪一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其周围都有汉族人口分布。而分别源于穆斯林族群、胡族群和肃慎部族3个族系的回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虽是在宋末至清初才迁入贵州地方,却给贵州世居民族增加了新的成员。其中,蒙古语和满语分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满一通古斯语族。分布今贵州的回族、蒙古族、满族多讲汉语,在日常生活中回族还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百濮族群的仡佬族,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四面八方不同族群和不同民族的融突和合,除集中居住黔东南几县外,其他成点状分布全省各地。特别是明代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将湖广、四川、云南等3个布政使司的边区划出而建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各族群人口穿插居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村落互相交错,形成了“又杂居,又聚居”、“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构成贵州多元族群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省份。

“大”,是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大,占全省总面积一半以上。秦代至元代,虽有汉族人口移住,大部分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仍为“夷多汉少”。明代以后,“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以及清代的“改土归流”,汉族移民巨增,逐渐形成“汉多夷少”。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根据贵州少数民族分布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至

1995年,先后批准在全省少数民族地方建立了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其中,1个自治县在自治州内,其他10个自治县分属3个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的土地面积为97 626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5.4%。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有1 409.3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0.18%。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等8个民族。从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组成情况来看,3个自治州,均由两个民族联合自治;11个自治县中的松桃、三都、玉屏、沿河等4个县,均为单一民族自治;镇宁、关岭、紫云、印江、务川、道真等6个县是两个民族联合自治,威宁县是3个民族联合自治。此外,为了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还建立了254个民族乡,分布全省各地。^④

“偏”,贵州虽然是一个“三不沿”(不沿边疆、不沿长江、不沿大海)的内陆省份,但是对全国来说仍处偏远山区。从秦汉至明清时期的两千多年间,历代中央王朝均采取“不边不内”的“羁縻”和“怀柔”政策治理;特别是建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的行政区时,是将湖广、四川、云南等3个布政使司的相邻边区划出而构成,实际上是周边各布政司一片片难以发展的边角的并合,不是边区而甚于边区。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部的滇东高原到湘西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区,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之间的亚热带岩溶化的高原山区。地形破碎,地面崎岖,地形的水平切割密度和垂直切割深度均居全国的前列,正是“地无三尺平”的历史地理成因。而且,高原、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97%,盆地及河谷坝子仅占3%,全省70%以上的地区均为石灰岩等碳酸质岩发育的岩溶地貌。由于受到这种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的制约,同一族群的各民族之间、乃至同一民族内部,由于山川阻隔,难于联系交往,构成了一个个封闭的自成一体的各具历史特点的“溪峒”或“山原”

的群体或支系,很少受到外界冲击力和吸引力的影响,大多各自按照传统文化轨迹运作,缓慢发展,使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这种内存不足、溪峒或山原运作的构成特征,完全取决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两种物质生活条件或要素。

“后”,是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明万历年间陈尚象、许一德纂修的《贵州通志》卷一记载:贵州建省时“纳粮不多,军卫屯田所贮,不支半年。”全省每年所征军卫屯科粮及府州田赋,总共不足 20 万担,不得不靠四川、湖广和云南协济。明朝宰相刘伯温(1311—1376)为鼓励云南、贵州的发展,曾赋诗预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到现今已经过去了 6 个世纪,虽然贵州各族人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特别是近半个世纪来贵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不但没有胜江南,而且差距越来越大。20 世纪 80 年代,贵州 3 340 万农村人口,人均耕地仅 0.8 亩,其中保证灌溉的基本农田仅 0.3 亩,全省每年均需从外省调进 7.5 亿公斤以上的粮食。进入 90 年代,全省各级财政每年投入水利建设的资金均超过人民币 6 000 万元,群众每年自筹资金数千万元,投劳 2 亿多个,兴修水利,实施“坡改梯”和“土变田”工程,大力推广农业适用技术,粮食生产在连续 6 年丰收之后,到 1998 年产量达到 1 100 万吨,终于实现了全省粮食自给^⑤。与东部沿海的“工业型经济”或商品型经济相比,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则属于“自然型经济”或资源型经济,即“听天由命”的经济,在缓慢的发展过程中起伏波动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传统循环”的属性。特别是麻山、瑶山地区,是全省少数民族贫困人口集中、贫困程度深、稳定解决温饱难度大的典型地区。要真正改变这种传统的“资源性”特征及其开发的“地理性”障

碍,没有高投入很难有产出或高产,而且对加工工业市场的依赖性也很大。只有在自然的、市场的、行政的协调控制下才有希望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或社会的面貌。毫无疑问,这一过程在贵州少数民族的发展史上必定异常艰巨,而且其发展变化的速度和程度,还直接关系到全国现代化的进程。

今天的发展,是对昨天的历史延续。目前,在经济形态方面,贵州正处于从农业经济形态向工业经济形态转型时期;在人或社会的形态方面,正处于从群体本位形态向个体本位形态转型时期。诚然,贵州面临着的是双重任务,一是要补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欠账,实现工业化;二是要赶上全国现代化前进的步伐,在工业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但是,从长远来看,从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存在的问题来看,不得不对贵州的发展方向再作一番思考。既要量入为出的思维,转换为量出为入的思维;又要以封闭的、静态的思维,转换为发散的、动态的思维;还要以线性的思维,转换为复合型的思维,认真审视、整合贵州的发展方向。显然,贵州绝不能走沿海的发展道路,用过度的工业化和资源的高消耗来做经济运转的催化剂。如果一味地用扩大工业化的办法来追赶沿海,不仅永远赶不上已遥遥领先的沿海,而且到头来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自断血脉。那么,贵州的发展只能放在全国的甚至世界的分工协作结构中来定位,将贵州得以留存下来的、丰厚的、自然的、原始的资源,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阶段上,以其稀缺性而裂变出巨大的能量,使其永久地持续地和合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制度文化素质的提高。贵州文化板块,实质上是具有贵州特色的区域文化,固然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3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是这个板块的基础,以贵州优于他地的矿产、能源、生物、旅游等4大资源为后发展能量,更换传统工业的发展思路,依靠自身的